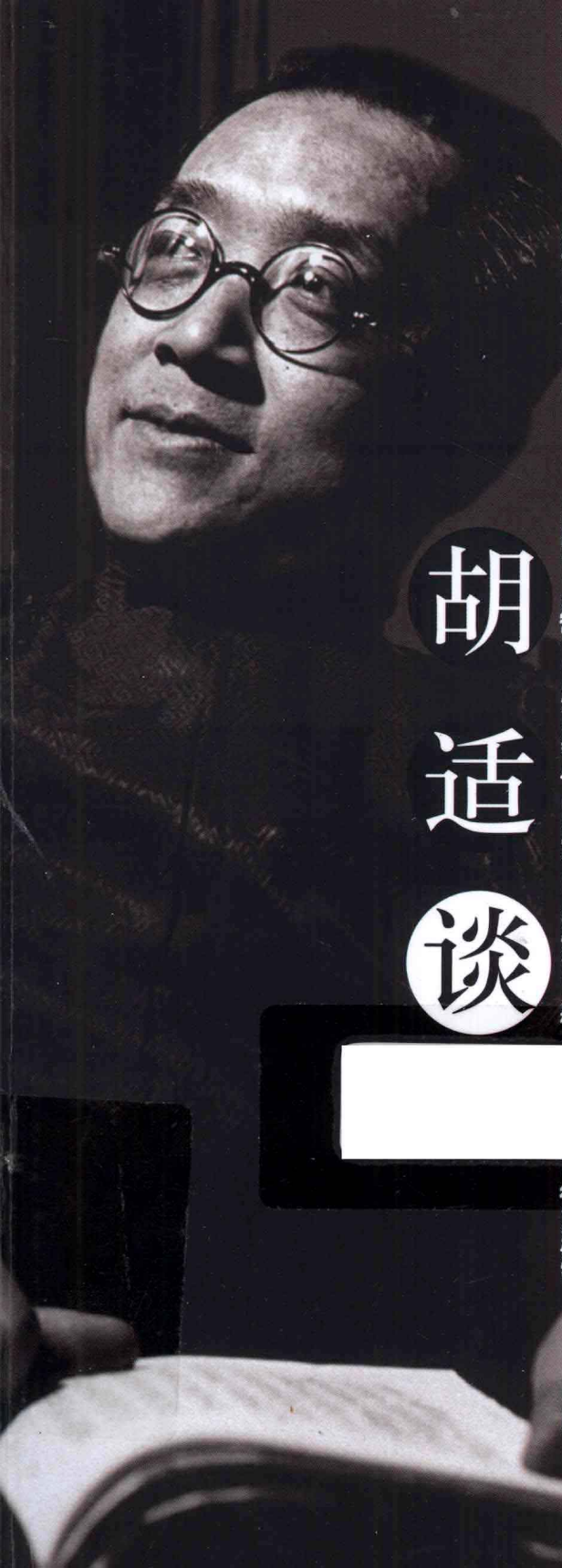




胡
适
谈

國學

胡
适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胡适谈国学

胡适
／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谈国学 / 胡适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13-3049-9

I. ①胡… II. ①胡… III. ①胡适(1891~1962) -
国学-通俗读物 IV. ①B261-49②Z1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5137号

胡适谈国学

著 者: 胡 适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王亚丹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241千字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3049-9

定 价: 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068999 传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诸子百家	001
儒教	003
关于孔子	009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015
关于荀子	021
儒教在汉代被确立为国教考	033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051
道家	090
道家的来源与宗旨	094
七十年的道家政治	102
杂家与道家	108
关于老子	110
庄子哲学浅释	125
汉初儒道之争	140
思想	143
谈谈中国思想史	145
推论与思想	148

目	
录	
002	
	春秋战国时代哲人思想的勃兴····· 152
	两汉魏晋的思想趋势····· 158
	文学 ····· 163
	什么是文学
	——答钱玄同····· 165
	文学改良刍议····· 168
	谈谈《诗经》····· 178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186
	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 219
	历史 ····· 247
	说史····· 249
	史学与证据····· 254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259
	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266
	编后记 ····· 275

诸 子 百 家

道家承认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道是自然流动变迁的，故“无成势，无常形”。一切依着自然变迁的趋势，便是“因循”，便是守“时变”。时机未成熟，不能勉强，故“不为物先”。

儒 教

一、汉高祖对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天下，安事诗书？”陆贾对他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书生的用处正在此。汉初盖公教曹参治齐国，建立了道家思想的信用；陆贾与叔孙通在高帝惠帝时的成绩，也建立了儒家的信用。叔孙通定朝仪，制定宗庙仪法，当时人称他为“圣人”，后世史家称他为“汉家儒宗”。

看陆贾《新语》。又《汉书》卷四三。（或《史记》卷九七，九九）

二、汉初之七十年（前200—前135年）是道家思想比较占优势的时代。无为的政治最适宜于那个年代；当大权的人既不配有为，还是无为最好，让人民休养生息。但儒家的学者往往看不惯这种消极的政治。贾谊（死在前168年）的《治安策》便是明白攻击当时的“无动”“无为”的政策。同时的晁错（死在前154年）也想积极有一番。但他们都失败了。贾谊死在迁谪，晁错斩于东市。武帝初年赵绾、王臧也想做一番积极的改革，被窦太后反对，都自杀在狱里。

看《汉书》卷四八及四九。又《胡适文存》三集卷七，页879~883。

三、窦太后死后，武帝亲政，招集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齐

人)是汉朝第一个儒生丞相。董仲舒(死在约前104年)虽不得势位,但他的思想影响了汉朝的制度,比谁都更伟大。儒学成为帝国的儒教,是汉武帝、董仲舒、公孙弘三人的成绩。在制度方面,如立五经博士,为国立太学的基础;如用经学选官,能通一经以上的补官,是科举制度的起源;如罢黜百家,专崇儒学,是统一思想学术的实行。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里开始实行的。

看《史记》《汉书》的《儒林传》(有些不易句读之处,须参看两书)。

四、这个时期是方士最得意的时代,儒生都不免受了方士的大影响。武帝封禅祠祀,都用儒生博士定仪礼,襄祭事。武帝建立的帝国宗教实在是儒生与方士合作的结果。试举郊祭上帝一事为例。汉承秦制,郊见五个上帝。方士谬忌等提议五帝之上还有个太一,被武帝采用了。又有人提议作“明堂”;《孝经》本有“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说,所以儒生也赞成此事。方士公玉带奏上明堂图样,武帝也采用了。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亲祠太一、五帝于明堂,用汉高祖作配。史臣大书道:“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这样实行《孝经》的儒教,其实是方士与儒生合作之功。

看《汉书·郊祀志》。看《春秋繁露》的《郊语》以下七篇,可知当日董仲舒等儒生确也极力主张郊天,所以能与方士合作。

五、儒教的大师董仲舒便是富于宗教心的方士,他的思想很像一个墨教信徒,尊信上帝,主张兼爱非攻。他深信天人感应的道理,他说:

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

这是天人感应的儒教的根本教义。他在这个根本教义上建立起他的阴阳灾异学:“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自己是个自信能求雨止雨的方士,著有求雨止雨的书(看《繁露》卷七四,七五)。他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推求灾难之故。他又是个治《公羊春秋》的学者,所以又用历史比例法(analogy)来推论灾异。他的方法是:“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

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这个方法分为三步：

第一步，先求《春秋》某件灾异之天意。（A由于B）

第二步，次求现今某件灾异与《春秋》灾异为“同比”。（a比A）

第三步，然后比例推求现今此件灾异之天意。（A由于B，而a比A，故a由于B）

例如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辽东高庙灾（a）。董仲舒说此事，先寻出《春秋》哀公三年（前491年）的桓宫、厘宫灾（A）可与“同比”；并先解释桓、厘宫灾的天意是要鲁侯“燔贵而去不义”（A由于B）；然后推定辽东高庙灾的天意是要武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a由于B）。董仲舒借此暗示武帝应该划除淮南王。他因此下狱，定了死罪，武帝特赦了他。这个方法，虽是荒谬可笑，但在当时却震动一世，成为正统的灾异学方法。一部《五行志》记的汉朝经学大师推论灾异，全用这个方法。两千年来的儒生论灾异，也都用此方法。

看董仲舒的《对策》（《汉书》卷五六），又《高庙灾议》（《汉书·五行志》上）。《汉书·五行志》不可不读，这是西汉儒教的绝妙写真。

六、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之学，本是阴阳家的思想，自从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便成了儒教的正统思想了。他用《尚书》里的一篇《洪范》作底子，把五行分配“洪范”的“五事”（貌木，言金，视火，听水，心土），每一件事的失德各有灾异感应。这个架子后来在夏侯始昌和夏侯胜的手里便成为《洪范五行传》。夏侯胜之学在汉朝成为显学，一传而有夏侯建、周堪、孔霸，再传而有许商、孔光等。许商与刘向各有《洪范五行传记》。这是灾异的“尚书学”，和上节说的灾异的“春秋学”相辅，合组成一个绝大规模的阴阳五行的儒教系统，笼罩了两千年的儒教思想。

看《汉书·五行志》及《儒林传》。此外应看《汉书》卷七五，七八，八一，八四，八五。

七、汉朝的儒教固然是迷信的，浅陋的，幼稚的。但这背后似乎含有深长的意义。汉帝国的创业者从民间来，知识不高，而专制

的淫威却不减于秦始皇、秦二世。夷三族、具五刑，不但行于高帝吕后之时，并且见于宽仁的文帝时代。儒家学者对于这独裁政体，竟没有抵抗的办法，只有抬有一个天来压住皇帝，希望在那迷信的帝国宗教底下得着一点点制裁皇帝的神权。董仲舒屡说“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这正是墨教“上同于天”的意旨，后世儒者都依此说。其实孔孟都无“屈民伸君”之说，汉家建立的儒教乃是墨教的化身。

比较《墨子·尚同篇》及董仲舒的《对策》《春秋繁露·玉杯》《阴阳义》《如天之为》《天地之行》等篇。

八、关于汉朝儒教的经典，近代学者创为“今文”与“古文”之说，其说起于廖平的《今古学考》（1886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与崔适的《史记探源》（1910年）更发挥此说，更走极端。诸家所说，并不一致，但总其大意，他们认为“今文”的经典先出，“古文”的经典晚出。先出的今文经传是《穀梁春秋》《公羊春秋》《仪礼》，齐鲁韩三家《诗》，今文《尚书》。晚出的古文经传是《左氏春秋》《周礼》《毛诗》，古文《尚书》（此仅举其大意）。廖平原来不过说：“今经皆孔子所作，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今学出于春秋时，古学成于战国时，今学西汉皆立博士，古学西汉多行于民间。”到了康有为、崔适，就说古文经传都是王莽时代刘歆伪造的了。

看所举廖、康、崔的三种书。反对此说的书甚多，看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九、平心看来，汉朝所出的经传，只有先出后出的次第，其中也有内容优劣的不同，但并没有两个对立的“今文学”和“古文学”的学派。王国维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秦并天下以后，用小篆和隶书统一文字，于是古文籀文并废。此说似甚可信。东方诸国之书都是用古文写的，中间经过焚书禁书之举（前213年），又经过长期兵祸，汉初的君臣又都不提倡读古书，挟书之禁虽已解除（前191年），求书的人还很少。《史记》说：“孝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这可见当日读古书者之

少。初出的经传都用“今文”重写，有经师教授，次第列在学官。但还有一些用“古文”书写的古书也陆续出现。其时去古稍远，非有特别的古文训练的人，已不能读这些古文书了。司马迁《自序》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所以能参考古文记载，著作《史记》。

《史记》采用了许多《春秋左传》的材料，是无可疑的；《史记》又提到《周官》，《封禅书》中有引“周官曰”的话。《史记·儒林传》记孔安国家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这三部书，——《左传》《周官》，古文《尚书》，——都是后来所谓“古文经”，在司马迁时都已出现，但因为它们晚出，虽然受史家的采用，却不曾得当时儒生的看重。当时儒生正走上了阴阳灾异的儒教的一路，他们要的是奇怪的微言大义，用不着那些记载事实掌故的史书。迷信的儒生竟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见《论衡·正说篇》）二十九篇既法天象，自然不许十六篇古文《尚书》加入了。但后出的这些书，经过学者的整理，如《左传》经过翟方进、尹咸、刘歆等人的整理，如《周官》经过王莽的“发得”，也许经过王莽的修改增补，——它们的价值就很明显了。到了西汉晚年，刘歆就主张把这些经传——《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列于学官”。“列于学官”就是在国立大学里添设这几科的讲座。当时的博士儒生大反对此事，刘歆失败了。后来王莽虽把这些书列在学官，并添上了《周官》，但王莽败死后，这些经传仍被废黜，古文《尚书》竟完全散失了。但《左传》《周官》《毛诗》，因为它们本身内容的价值，到了三国以后，终被列入学官，渐渐替代了今文经传的地位。

看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卷七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史记〉所谓古文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者》；又卷五的《史籀篇疏证序》；又卷四的《汉魏博士考》。看《汉书》卷三六《刘歆传》。又看陆侃如译的Karlgrén《左传真伪考》。

十、从董仲舒到王莽，百余年之间，儒教经历了不少的变化，如：

(一) 经典的增多;

(二) 学派的新起(比较《史记》《汉书》的《儒林传》);

(三) 学术的发达(看《汉书·儒林传》的《王莽传》)。

但最大的变化是政治上的大变动。刘氏后代不振作,政权移归王氏,而王莽最得人民和学者的信仰。王莽要做皇帝,于是奉承他的人都不谈灾异了,大家抢着制造祥瑞符命,于是灾异的儒教遂变成了符讖的儒教。符讖把王莽捧上帝位(适按,武功井中白石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临淄新井,天公使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哀章作为高庙铜匱,高帝玺书:“王莽为真天子”),也把刘秀(光武帝)从民间送上帝座。这时代的迷信黑暗也不下于汉武帝时代。

看《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纬书》一门。

看《汉书·王莽传》,《郊祀志》最后一部分。

看《后汉书·尹敏传》《张衡传》《桓谭传》。

十一、然而在那黑暗的迷雾里,我们仍可以看出一个有力的社会改革运动。晁错、董仲舒以至王莽,这班儒生都抱着改革社会的大志愿。董仲舒主张限制私有田产,又反对奴婢制度。哀帝时,儒生师丹辅政,实行限制私有田产和奴婢,都被贵族大臣反对掉了。王莽建国之后,实行土地国有,禁止私人买卖田地奴婢;又行“六筦”之命,把一切重要的生产事业都归国家管理;又设立种种调均人民经济的机关,平物价,办国家赊贷机关。他的经济政策很含有国家社会主义的意义,其目的在于“均众庶,抑并兼”。他是董仲舒的嫡派,他是汉朝儒教运动的精神的伟大代表。

看《汉书·食货志》《王莽传》。

看《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王莽》,又三集卷七《再论王莽》。

廿、五、十六夜

关于孔子

孔子略传

孔子，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他一生的行事，大概中国人也都知道，不消一一叙述了。他曾见过老子，大概此事在孔子三十四岁之后。

孔子本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他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又做过司寇。鲁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资格做定公的候相，和齐侯会于夹谷，很替鲁国争了些面子。后来因为他的政策不行，所以把官丢了，去周游列国。他在外国游了十三年，也不曾遇有行道的机会。到了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专做著述的事业。孔子晚年最喜《周易》，那时的《周易》不过是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条卦象传，三百八十四条爻象传，六十四条彖辞。后人又把他的杂说纂辑成书，便是《系辞传》《文言》。这两种之中，已有许多话是后人胡乱加入的，如《文言》中论四德的一段。此外还有《杂卦》《序卦》《说卦》更靠不住了。孔子还作了一部《春秋》，孔子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的。就是《易经》的诸传，也是根据原有的《周易》作的，就是《春秋》也

是根据鲁国的史记作的。

此外还有许多书，名为是孔子作的，其实都是后人依托的。例如一部《孝经》，称孔子为“仲尼”，称曾参为“曾子”，又夹许多“诗云”“子曰”，可见绝不是孔子作的。《孝经·钩命诀》说的“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话也是汉人假造的诳语，绝不可信。

一部《论语》虽不是孔子作的，却极可靠，极有用。这书大概是孔门弟子的弟子们所记孔子及孔门诸子的谈话议论。研究孔子学说的人须用这书和《易传》《春秋》两书参考互证，此外便不可全信了。

孔子本有志于政治改良，所以他说：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又说：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后来他见时势不合，没有政治改良的机会，所以专心教育，想要从教育上收效。他深信教育功效最大，所以说“有教无类”，又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史记》说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话虽不知真假，但是他教学几十年，周游几十国，他的弟子必定不少。

孔子的性情德行，是不用细述的了。我且引他自己说自己的话：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话虽不大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人的口气，却很可想见孔子的为人。他又说他自己道：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是何等精神！《论语》说：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知其不可而为之”七个字写出一个孳孳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

孔子的时代

孟子说孔子的时代，是：

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这个时代，既叫作邪说暴行的时代，且看是些什么样的邪说暴行。

第一，“暴行”就是孟子所说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了。

《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共有弑君三十六次。内中有许多是子弑父的，如楚太子商臣之类。此外还有贵族世卿专权祸国，如齐之田氏，晋之六卿，鲁之三家。还有种种丑行，如鲁之文姜，陈之夏姬，卫之南子、弥子瑕。怪不得那时的隐君子要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

第二，“邪说”一层，孟子却不曾细述。我如今且把那时代的“邪说”略举几条。

（一）老子 老子的学说，在当时真可以算得“大逆不道”的“邪说”了。你看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又说“圣人不仁”，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①又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去知，民利百倍”。这都是最激烈的破坏派的理想。

（二）少正卯 孔子做司寇，七日便杀了一个“乱政大夫少正卯”。有人问他为什么把少正卯杀了，孔子数了他的三大罪：

- （1）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
- （2）其谈说足以饰邪荧众。
- （3）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

这三件罪名，译成今文，便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

（三）邓析 孔子同时思想界的革命家，除了老子，便该算邓析。邓析是郑国人，和子产、孔子同时。《左传》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郑驷颺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那时子产已死了二十一年

① 此句疑为有误，应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为保留胡适先生原著风貌，此处不作改动。

（子产死于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吕氏春秋》和《列子》都说邓析是子产杀的，这话恐怕不确。第一因为子产是极不愿意压制言论自由的。《左传》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可见子产绝不是杀邓析的人。第二子产铸刑书，在公元前536年，驷颢用竹刑，在公元前501年。两件事相差二十余年，可见子产铸的是“金刑”，驷颢用的是“竹刑”，绝不是一件事（金刑还是极笨的刑鼎，竹刑是可以传写流通的刑书）。

邓析的书都散失了，如今所传的《邓析子》乃是后人假造的。我看一部《邓析子》，只有开端几句或是邓析的话。那几句是：

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

这话和老子“天地不仁”的话相同，也含有激烈的政治思想。

《列子》书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吕氏春秋》说：

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

又说：

郑国多相悬以书者（这就是出报纸的起点）。子产令无悬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悬书是把议论张挂在一处叫人观看，致书是送上门去看，倚书是混在他物里夹带去看）。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亦无穷矣。

又说：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